
生态环境保护与农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机制研究

——以四川藏区为例

李治兵，舒莉，赵睿祥，朱宝莉¹

摘要:低水平的农业发展方式打破了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使该区域面临着严重的农业生态环境问题。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促进产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对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和归纳总结法，对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的作用机制、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的统一性及驱动因素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区域贫困、经济发展滞后、人力资源不足是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在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发展目标上具有统一性，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等内部因素以及政府主导、市场需求和社会参与等外部因素是二者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四川藏区应将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条件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业等特色农业，优化区域资源配置，降低资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协调发展之路。

关键词:四川藏区； 农业生态环境； 特色农业； 产业精准扶贫； 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X171. 4; F323. 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 — 1707(2019)02 — 0051 — 07

一、引言

农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第一产业，也是与生态环境联系最紧密、受生态环境影响最直接的产业^[1]。长期以来，农业作为贫困地区主要产业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严峻的生态问题。贫困问题与农业生态问题的交织，使区域贫困问题更趋复杂，脱贫难度更大。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实施生态移民、控制人口增长、就业援助等措施来缓解农业生态恶化和促进贫困人口脱贫^[2-3]。这些措施在缓解贫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没有从产业发展的角度考虑贫困减缓问题。在自然环境、经济和社会等多重因素的约束下，贫困人口对土地的依存度较高，从事农业生产仍是其维持生计的主要手段，因地制宜地发展特色农业是贫困地区摆脱贫困的重要路径。

¹**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新型城镇化进程中西南民族地区传统村落保护路径研究”(15AMZ010);四川省科技厅软科学项目“羌族地区城镇化推进与旅游业互动研究”(2016Z R 0102);阿坝州社会科学事业专项资金项目“阿坝州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研究”(ABKT2019058)。

作者简介:李治兵，男，阿坝师范学院实习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汶川 623002)

舒莉，女，西华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

赵睿祥，男，阿坝师范学院实习研究员；

朱宝莉，女，长江师范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

二、研究现状回顾

国外在探讨农业发展问题时，强调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多主张采用可持续的农业发展策略。Keeney(1989)认为可持续农业是“有利于生态环境、具有生产性且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和保持乡村社会结构的一个系统”^[4]，Brklacich(1991)认为在农业生产时要进行农业生态环境核算，包括水土流失、土壤退化、酸化沉淀、气候变化等^[5]。Pierce(1990)认为可持续农业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生态环境方面能够维持和强化农业资源基础，二是社会经济方面能够为生产部门或社区提供相应的经济报酬，三是能够为生产者产出足够的粮食^[6]。

国内文献主要关注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影响因素及治理路径。在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主要从生产因素和制度因素进行了探讨，认为农药、化肥等现代农业技术的过度使用以及秸秆的随意焚烧等是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生产因素^[7]，农地制度不健全^[8]、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不完善^[9]、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本市场发育滞后^[10]是影响农业生态环境的制度因素。针对农业生态环境面临的问题，学者们提出要树立农业生态环境战略安全观，构建国家农业生态环境安全体系^[11]，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包括农业生态补偿管理体系、农田地力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农业面源污染全程监管防控体系、定期休渔禁渔生态补偿机制、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补偿机制等^[12]。

贫困问题往往与生态问题相互交织，贫困率和贫困度的大小与生态环境的状况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13]。现有研究关于农业生态环境恶化影响因素及其治理路径的探讨，为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改善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但综合看来，将贫困问题与农业生态环境进行关联研究的成果较少。贫困地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的作用机制是什么？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扶贫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本文以四川藏区为例，对上述问题进行探索，以期对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扶贫协调发展提供借鉴。

三、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脆弱的作用机制

四川藏区位于四川省西部，由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藏族自治州和木里藏族自治县构成，共32个县，幅员面积25.04万平方公里，占全国藏区的11%，占四川省的51.49%；有人口216万人，其中农村人口有146万人。四川藏区是我国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全国第二大藏区，也是深度贫困地区。受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因素叠加影响，农业生产成为四川藏区贫困人口的主要生计来源。长期以来，低水平的发展方式打破了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使四川藏区面临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同时，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对贫困地区农业发展形成自然约束，使四川藏区陷入生态环境恶化与区域贫困的恶性循环。在脱贫攻坚过程中，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发展之间的关系，对四川藏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具有稀缺性，尤其是经济价值较高的自然资源其稀缺性更加突出。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在社会经济活动中往往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在这种逐利的过程中，必然会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农业生产是四川藏区贫困人口最重要的生计来源。长期以来，低水平的发展方式打破了农业生态系统平衡，使四川藏区面临着严重的农业生态问题，其作用机制可以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一）区域贫困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一般来说，贫困地区的经济活动对自然资源与环境的依存度较高，受制于内生发展能力，贫困地区的人口更倾向于直接向自然资源获取必须的食物和收入。贫困地区的贫困往往与地理资源禀赋的不足密切联系。自然地理禀赋的缺失形成了贫困的初始成因，并生成贫困发生的硬环境，生态进一步延展地理自然禀赋对贫困的影响，加剧贫困的黏性^[14]。四川藏区位于横断山脉的核心地带，地形复杂、耕地资源破碎，加之频发的冰冻、雪灾、地震、暴雨、滑坡、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对农业生产的破坏，使本就有限的农业生产资源更加紧张，使该区域贫困人口收入水平低且收入增长乏力。出于生计需求，贫困人口一般只能通过强化利用有限农业生产资源如砍伐森林、过度放牧等粗放的农业生产手段来维持生存。这些生产方式虽然在短时间内

会增加产出，但从长期来看则加剧了土地生产能力的匮乏，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构成强大的压力，形成“自然地理禀赋不足——贫困——掠夺式开发——环境进一步恶化——更加贫困”的恶性循环，使四川藏区形成生态陷阱并制约反贫困行动。

（二）区域经济发展滞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人类的所有需要都可归结为“经济需要”，在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有不同的个体和群体的利益要求^[15]。在经济发达地区，在追求农业生产所产生的物质利益的同时，也更加关注农业的生态服务功能，对生态环境的改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四川藏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贫困人口从事农业生产的首要目标。经济发展的滞后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机制的突出表现为农业生产活动的负外部性。经济学理论认为，外部性是指某个经济主体的行为所产生的成本和收益并不完全由该经济主体自身承担和享受，而对其他经济主体产生影响，通常将私人成本小于社会成本、私人收益大于社会收益的情况称为负外部性^[16]。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公共产品属性，对其产权难以进行明确界定，导致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往往出现“公地悲剧”；另一方面，尽管政府倡导并实施了诸如退耕还草、植树造林等农业生态保护项目，但由于这些项目的回报周期长，社会收益大于私人收益，在实施过程中，贫困人口更倾向于扩大种植经济作物面积或畜牧养殖规模等收益更高的农业生产活动。由于受地理、环境、历史等因素的影响，四川藏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总体偏低，贫困人口在从事农业生产的过程中，一般会将满足自身生存的物质需求置于首位，甚至以不惜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短期的逐利行为导致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进而又限制了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使四川藏区陷入“生态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滞后”的恶性循环。

（三）人力资源不足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

虽然贫困本身并不一定导致环境恶化，但贫困人口应对贫困的行动选择却是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人力资源不足是贫困地区陷入贫困的重要原因，贫困人口有限的行动能力和选择范围是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的重要因素。与发达地区相比，四川藏区贫困人口文化素质和科学素养偏低，人均受教育年限仅有 6.4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数据显示，阿坝、甘孜两州的文盲比例分别为 12.39% 和 30.17%，其中农业生产经营者文盲率高达 30.5%，尤其是中老年中文盲、半文盲比例较高。一方面，较低的人口素质使贫困人口对知识、技术的接受能力较差，只能以较原始的、粗放的方式从事农业生产，农业资源使用效率低。另一方面，四川藏区人口多分布在地理环境闭塞区域，地缘、血缘、亲缘特征明显，其社会网络呈现垂直结构状态，显示出“分块型”的社会特征，“块与块”之间难以建立“弱”联系，导致信息、创新及人力资源的传递困难^[17]。信息的封闭、人力资源的不足以及地域之间的分割，使四川藏区在特色农业发展战略布局 and 利益联结机制方面存在不足，难以形成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规模化市场和创新发展产业集聚格局，极大地限制了贫困人口的选择范围。相反，长期以来分散、粗放的农业发展特点，使四川藏区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联动效应不足，进而使区域农业发展陷入“技术含量低——产业间互补不足——生态环境被破坏”的恶性循环。

四、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统一性分析

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是辩证统一的，生态环境是产业发展的自然基础支撑，产业发展是调节生态环境的重要途径。良好的生态环境能够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经济发展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和优越的生存环境，促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优势产业。而建立在生态环境耗损、资源无序利用上的产业结构会逐渐丧失比较优势，最终导致产业衰退与环境保护的双重危机。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核心问题是可持续问题，它要求要将环境资源作为产业发展的内在要素，把“绿色化”“生态化”作为产业发展的内容和路径，把实现环境、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存在着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正向关系，集中表现为二者在价值取向、实现路径和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

（一）价值取向的一致性

贫困地区具有特殊的生态位和发展位，经济发展水平低，贫困问题严重，其发展面临着多重不平衡性，生态功能重要且自身生态极其脆弱。面对经济发展与生态治理的发展伦理问题，在精准扶贫背景下，将生态保护与特色产业发展相结合，是基于区域生态危机与经济发展困局做出的理性选择。保护生态环境是为了保障人民的环境权和健康权，发展特色产业是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存权和发展权，不管是追求生态保护，还是狠抓产业发展，其主要价值都是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二者在价值取向上并不孤立，而是高度一致，离开生态保护谈产业发展是竭泽而渔，离开产业发展谈生态保护则是缘木求鱼。

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在价值取向上具有一致性。生态环境保护明确了资源禀赋的利用范畴，为实施产业精准扶贫指明了方向。在国家主体功能区中，四川藏区是若尔盖草原湿地生态功能区和川滇森林及生物多样性生态功能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和提供生态产品是该区域的首要任务。农业生态环境的修复要求退耕还草、退耕还林，恢复和增加植被，治理水土流失等，对区域内的国土资源进行统一规划，因地制宜地开发和利用特色资源，推动生态种植业、生态养殖业、生态农产品加工业、休闲农业等特色农业的发展，并逐渐成为区域产业扶贫的主要路径。其次，特色农业的发展可以促进四川藏区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农业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利用，缓解土地等自然资源压力，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排放，促进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的修复与保护。

（二）发展路径的一致性

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新时期的精准扶贫工作的推进要以绿色发展为指导，既重视对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的经济扶持，也要兼顾对生态环境的有效保护，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优化同步协调进行 [18]。农业本身的绿色属性决定了农业现代化的绿色发展内涵 [19]，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产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的主要路径就是发展绿色产业，即根据区域的资源优势，以自然生态资源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通过政策和资本的驱动，重点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业等绿色产业，将开展生态经济作为贫困人口增加收入的重要途径。

四川藏区既是重点生态功能区，也是自然生态资源富集区域，发展特色农业是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减贫的重要途径。四川藏区发展特色农业应注重规划先行和转变生产方式。注重规划，厘清发展目标和步骤，根据既定规划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这些政策既要兼顾经济稳定增长，又要有利于完善收入分配，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同时还要逐步限制资源和排放密集型的发展模式。转变生产方式，在对传统农业生产结构进行调整的同时，大力发展环保型、节能型、新能源等绿色农业项目，逐步提升区域生产能力，创造工作岗位，转移农村过剩劳动力，增加贫困人口收入途径，缩小收入差距。

（三）发展目标的一致性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是高资源消耗、外源推动的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方式虽然在一定阶段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其资源无序利用、生态环境被破坏、产业结构不合理、生产方式落后等弊端，也使贫困地区陷入“经济发展——环境恶化——贫困”的陷阱，是一种不友好、非可持续发展方式。面对严峻的生态系统退化和复杂的脱贫攻坚局势，追求可持续发展已成为贫困地区发展的重要目标。可持续发展包含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三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加强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是基于其严峻的生态破坏现实和在国家及国际上极其重要的生态战略地位做出的正确反映，是追求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具体体现；实施特色产业精准扶贫，是基于贫困地区资源禀赋条件、落后的发展方式和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等现实情况做出的精准反映，是追求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体现。

农业生产是四川藏区贫困人口重要的生计来源，实施特色农业精准扶贫是四川藏区贫困人口可持续脱贫的依托，是促进区域生态、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特色农业的发展可以促使区域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改善区域人口生活环境；可以带动区域贫困人口就业，增加收入渠道，进而减少贫困人口对土地等自然资源的过度依赖，减少对资源环境的破坏。同时，四川藏区实施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可以进一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以低能耗、低污染的环境友好型产业带动区域产业融合与集聚，使生产经营方式优化升级，实现生态、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五、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

区域生态系统与经济系统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贫困地区特殊的生态位和发展位决定了产业的选择。四川藏区属于重点生态功能区，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与其主体功能区定位和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存在着较大偏差。四川藏区的特色农业精准扶贫的实质是对既有农业结构的优化调整，以结构的优化调整来促进资源的有序利用。即以贫困人口为主体，以区域资源禀赋优势、产业发展基础和基础设施为基础，围绕主体功能区定位，在政府主导、市场需求和社会参与的共同驱动下，选择和培育特色农业，实现特色农业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市场化、服务一体化的格局，达到资源配置与利用高效、贫困人口增收、人文社会环境改善、资源环境压力减小等多重目标，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特色产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一）内部因素

1. 资源禀赋

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禀赋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础，影响着区域产业结构的演进和形成。四川藏区拥有丰富的草原资源、水能资源、动植物资源、旅游资源，素有“绿色宝库”“天然动物园”之称，这些资源为发展特色农业提供了资源禀赋优势。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就是要以“绿色”“生态”为实现路径，以四川藏区自然资源和自然条件禀赋为基础，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业等特色农业，培育和扶持产业基地发展，促进区域特色产业向专业化、规模化和集聚化方向发展，使资源优势转换为经济优势，使经济优势形成竞争优势。

2. 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是区域产业结构发展的重要保障。基础设施的合理配置，对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增加产品需求具有促进作用。同时，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有效带动下游产业的发展，加强区域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实施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可以有效促进贫困地区的交通、电力、通信、水利等基础设施建设，合理配置贫困地区生产要素，缓解对耕地、森林、草原等有限生态资源的过度利用，有效恢复和保护四川藏区生态环境。同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大规模投入，也会使相应行业的产值增加，就业人数增多，对改变产业结构和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3. 产业基础

现在的经济社会等系统结构和形成路径，一定程度上锁定在过去的结构和路径上 [20]，传统优势产业对区域专业化市场、产业集聚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四川藏区已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近 30 个，涵盖生态种植业、生态养殖业、生态农产品加工等行业，特色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特征逐渐显现，特色农产品的品牌效应初显。发展特色农业可以为市场提供绿色、生态产品，与国家主体功能区引导发展产业契合。四川藏区现有的特色农业发展基础，为区域的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奠定了较好基础。

（二）外部因素

1. 政府主导

各级政府是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精准扶贫的责任主体，在规划引领、政策引导、项目支持中起主导作用。规划的制定为产业选择、产业发展确定了方向；相关政策的制定为产业发展创造外部环境，促进产业发展与区域减贫和生态环境保护有机结合；项目支持明确了工作机制，通过项目驱动来具体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特色产业发展。近年来，各级政府出台了系列政策，例如，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编制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意见》《四川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四川省主体功能区规划》《四川省“十三五”生态保护与建设规划》等，为生态环境保护和产业精准扶贫工作提供制度保障，配置各项资源，统筹推进相关工作。

2. 市场需求

市场需求是产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随着我国生产能力的提高和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成熟，消费需求已经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现阶段我国消费趋势呈现出“消费不断向新领域拓展、中下层居民的消费得到优先和更快增长、消费中的不健康不合理成分被剔除或减少、消费的个性化多样化选择性强化、网购等新型交易方式快速推广”^[21]的特征。同时，随着环保、健康理念在消费行为中的不断深化，消费者对生态、绿色、休闲产品的需求趋于旺盛，消费需求的提升为生态资源丰富的四川藏区农业创新和升级提供了契机，有助于特色农业的发展。

3. 社会参与

精准扶贫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全社会的责任。2014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动员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扶贫开发的意见》明确指出要“充分发挥各类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各界作用，多种形式推进，形成强大合力”，《四川省“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也提出要“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三位一体的大扶贫格局。”政府层面的引导，激发了社会各界参与扶贫的热情。民营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NGO、志愿者等社会组织在特色产业培育、技术支持、就业培训、项目评估等方面积极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同时，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一般具有公益性和专业性等特征，在具体工作中，更加注重项目本身的实际效果，能够较多地将区域生态环境、文化背景、社会发育等因素纳入扶贫工作之中，注重各因素的协调发展。

六、结语

贫困问题与生态环境问题紧密关联，区域贫困、经济发展滞后、人力资源不足是导致四川藏区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重要诱因。农业生产是四川藏区贫困人口的主要生计来源，也是其摆脱贫困的重要路径。实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特色农业精准扶贫协调发展是在区域特殊的生态位和发展位下做出的必要选择，二者在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发展目标方面具有一致性，资源禀赋、基础设施、产业基础等内因以及政府主导、市场需求、社会参与等外因是二者协调发展的驱动因素。

当前，四川藏区面临着生态环境保护和精准脱贫的双重压力，应该坚持走农业生态环境保护与特色农业协调发展之路，将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和资源禀赋条件有机结合，大力发展生态农业、生态牧业、生态林业等特色农业，优化区域资源配置，降低资源消耗，改善生态环境，逐步形成“生态环境保护——特色农业发展——农民脱贫致富——社会和谐发展”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参考文献：

[1] 牛敏杰, 赵俊伟, 尹昌斌, 唐华俊. 我国区域农业生态文明及其协调度的时空分异研究——以典型省份为例[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6, (4).

[2] 陈南岳. 我国农村生态贫困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3, (4).

[3] 王丽华. 就业援助: 西部农村反贫困的现实抉择——基于减缓地缘性贫困和生态贫困的视角[J]. 理论探讨, 2012, (2).

-
- [4] Keeney D R. Toward a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Need for clarification of concepts and terminology [J]. American Journal of Alternative Agriculture, 1989, (3) .
- [5] Brklacich M, Bryant C R, Smit B. Review and appraisal of concept of sustainable food production systems [J].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1991, (1) .
- [6] Pierce J T. The food resource [M]. London: Longman, 1990.
- [7] 朱琴华, 陈利, 沈小婷. 农业生产与农业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路径探讨——以江苏省为例 [J]. 财贸研究, 2013, (6) .
- [8] 曾鸣, 谢淑娟.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制度成因探索 [J]. 广东社会科学, 2007, (4) .
- [9] 张金艳. 我国农业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制现状、问题及对策 [J]. 学术交流, 2013, (5) .
- [10] 刘小鹏, 王亚娟. 民族地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投融资机制研究 [J]. 经济问题探索, 2006, (10) .
- [11] 刘助仁. 中国农业生态环境安全问题与战略应对 [J]. 环境保护, 2009, (23) .
- [12] 张宝文, 关锐捷. 中国建立农业生态环境补偿机制的现状与对策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1, (9) .
- [13] 李虹. 中国生态贫困的主体分析 [J]. 生态经济, 2013, (8) .
- [14] 张丽君, 董益铭, 韩石. 西部民族地区空间贫困陷阱分析 [J]. 民族研究, 2015, (1) .
- [15] 吕晓英, 吕胜利. 农业生态环境改善的利益驱动机制 [J]. 甘肃社会科学, 2010, (1) .
- [16] 董法尧, 陈红玲, 吴建国. 我国旅游资源产权结构与旅游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以民族村寨旅游资源为例 [J]. 云南社会科学, 2016, (2) .
- [17] 廖桂蓉, 李继红. 社会资本视角下四川藏区贫困问题研究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2009, (9) .
- [18] 莫光辉, 陈正文, 王友俊. 新发展理念与精准扶贫的契合及实践路径 [J]. 广西社会科学, 2016, (6) .
- [19] 尹贻梅, 刘志高, 刘卫东. 路径依赖理论及其地方经济发展隐喻 [J]. 地理研究, 2012, (5) .
- [20] 田江. 农业生态——经济系统协同发展研究进展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2017, (4) .
- [21] 易培强. 经济新常态下消费发展的基本特征与主要对策 [J].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5, (5) .